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丛刊

齐锡生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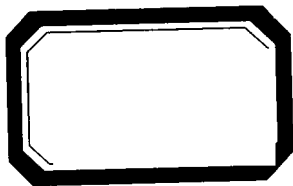
剑拔弩张的盟友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
中美军事合作关系 (1941~1945)

上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代史研究所·民国

剑拔弩张的盟友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
1941 ~ 1945 (上册)

齐锡生 著

(CHI, HSI - SHENG)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作者的话

本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的学生时代。我初到美国去读研究院时，正值肯尼迪任职总统。当时在美国中西部所见到的，真可以称得上是土地丰腴，国泰民安，民间充满乐观，学术界思想活泼。在经过了麦卡锡时代的惨痛教训后，学术界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蓬勃朝气和冲劲。各种具革命性的理论和学说相继涌出，那才是一种货真价实的百花齐放场面。它既让年轻学生们有目不暇接的兴奋，又有追赶得喘不过气来的压力。

我当时主修的学科是国际关系理论，由于所追随的老师正是新理论的倡导者，因此纵使我本人只不过是一个未出茅庐的后生晚辈，然而在老师的提携下，居然有幸和当时世界知名学者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提交自己的论文聆听他们的指正，并被他们采用和予以发表。对于一个刚刚进入研究院的嫩学生而言，这种机会对于我个人此后心智的发展，都有莫大影响。

与此同时，我也首次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关于中国问题的英文著作。在这种情况下，在我整个研究生涯里，国际关系理论是我的

正经课，而中国近代史著作则是我的课外读物。大约在三四年内，把当时美国官方出版的对华外交文献和学术界出版的专著都看了许多。而在这些课外读物中，最引发我兴趣的莫过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美同盟关系。我当时认为这些英文书籍的内容不但史料新颖，而且分析入微。当时的我，是一个对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个人深感失望和满怀抵触情绪的年轻学生，在美国能够读到的作品，无论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都让我感到茅塞顿开和激赏不已。我立即得到的印象是，有关这个课题的学术成果已经完全成熟，未来的学者大概不可能超越它们去做出新的建树。

如果说在阅读这些英文著作过程中，最初曾经有过任何一丁点让我感到欠缺的话，那就是它们对中文资料的引用不足。比如说，许多学者在分析中美关系时都经常谈到蒋介石的动机，但是又不注明史料的来源。然而由于他们那种言之凿凿的架势，与当时美国学术界似乎对中美关系历史已经形成高度“共识”的气候，又使我自然地相信他们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只是内心总不免被一丝疑问所困扰，那就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的证据是什么？”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这个学术成果是丰盛正确的。至于自己心中的这个疑问，其动机并非对现有的学术成果不满，而只是认为它是一个美中不足，是没有提供中文资料去阐述它的论点而已。因此，即便当我最初动念要从事一点有关中美同盟关系的研究时，其目标也非常有限，只是想在现有的学术框架下，针对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去研读一些中文资料，把一些在英文著作里没有交代清楚的事件，以中文史料作为补充或是旁证而已。出于这种心态，所以在最初选择研究课题时，都是比较琐碎，着重历史叙述，既缺乏整体观，也不打算向现有的学术定论提出评判或是予以推翻。

意想不到的，在逐渐深入研读中文原始资料的过程中，开始发现中文资料所呈现的史实，和英文著作所引述的史实不但时有矛盾，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这就让我原来以中文资料补充英文著作的设想完全落空了。而且愈是扩大对中文资料的研读范围，愈是看出

中英文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上经常对不上号。

面对这一意想不到的困境，我最后只好采用一个虽笨拙但是应该可靠的方法，那就是借镜自然科学家们早已行之有效的实验方法。简单地说，科学家的发明或是发现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他们的实验可以由别人用重复的方式来检验它的可靠性。换言之，如果每次用同样的元素在同样的条件下运作，就应该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诚然，历史学的科学性远不如自然科学，但是如果用同样的史料，至少也应该得到相近的结果才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一定是有其他的因素介入使然，而这种现象本身也就值得加以重视了。

基于这份好奇心的驱使，我开始试着重新去走一遍以前学者们已经走过的老路，也就是尽量去阅读他们在英文学术著作中所引用过的原始资料。即使这些资料多年来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纳，甚至重复引用，几乎已经成为具有高度权威性权威的“定论”时，我也把原文再看一遍，不敢轻易放过。我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求得一个安心，指望能够肯定地知道英文学术著作是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建构完成，同时也希望借此找出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中英文著作之间的差距会如此之大。

这种尝试一旦开始，才发现英文资料的阅读工作量远远超过原先的估计。其中一个原因是，学术界大量著作是根据英文史料写成，它们引用的资料来自各方面。另一个原因是，英文的重要史料在数量上的确比中文丰富。如果一位学者想要在这个领域内取得发言权的话，当然应该充分了解过去学者著书立说的根据是什么。

本书作者在花了许多年时间阅读英文原始资料后的体会，大致可以分为三方面。第一，现有的英文学术著作的确引用了大量而又丰富的史料。许多学者治史态度的勤奋和认真，使得他们能够把历史学研究的业绩不断向前推进。这种努力值得钦佩和借镜。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西方历史学家能够占据学术界的阵地，在世界史学界赢得主导地位。第二，某些学术著作对史实的叙述并不完

全正确。它们不但经常错误地叙述中国史，也错误叙述美国史。错误的叙述难免导致错误的分析和结论，两者都应该加以修正。第三，有价值的英文原始史料其实远比目前学术著作所已经引用者更丰富。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史料虽被广泛引用，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并未被学者们所体察。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当有些史料的内容不符合学者们预设的立场或是结论时，它们就可能被忽视或蓄意掩盖，乃至被扭曲。

一旦有了这种体会，作者就开始相信，中文和英文对史实的叙述之所以对不上号，与其说是它们一方肯定有错误或是偏差，还不如说是它们没有被学者充分地结合运用。因此，战时中美军事合作关系史绝非一门已经“盖棺论定”的学问，它反而是一块可以让学者去耕耘的肥沃土壤。通过查证旧的史料和发掘新的史料，学者们可以有机会去重新思考历史问题，检验学术成果，并进而开阔学术视野。

本书所引用的资料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中文资料和英文资料。

中文资料部分包括三类。第一类是战时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文件。这包括宋子文、孔祥熙、顾维钧、陈诚、胡适、陈光甫、熊式辉、蒋介石、王世杰、徐永昌、翁文灏等人的日记或是回忆录。其中，近年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当然最为重要。第二类是政府原始档案文件。其中包括大量报告，部会间的公文来往，领导人之间的书信、电报、手谕、手稿、备忘录，驻外机构和人员（使馆和武官）的情报、请示等等。另外还有中国、美国及其他盟邦间的外交电、军事计划、战斗报告等等。虽然这些资料在原先都是保密的，但是在过去几十年来已逐渐解密。第三类是历年来以中文出版的有关中美同盟关系的学术著作和政府重要文件汇编。

英文资料部分同样包括三类。第一类是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领导人的私人文件档案。这些人包括罗斯福、居里、项贝克、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窦恩和波特勒等人。第二类是史迪威和马歇尔之间大量的无线电通讯，魏德迈和马歇尔之间

的书信来往，国务院的内部文件和指令，美国参谋总长会议的会议记录，英美参谋总长联席会的会议记录，英美两国军方的来往文电和会谈纪要，盟邦重要国际会议的记录（开罗会议），作战计划草案或是决议案。第三类则包括所有的重要官方文件（国务院）和政府公报，以及有关罗斯福、史汀生、马歇尔、摩根韬、李海、霍普金斯、赫尔利、拉铁摩尔、赫尔等领导人的杂记、日记，或访问记录。当然，英文中有关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和军事计划的学术专著也是非看不可的资料。

依照作者的观点，当前不少学术著作（尤其是众多的英文著作中）存在两个需要改正的缺点。

第一，它们虽然声称讨论中美同盟关系，但其实着重点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很少讨论中国政府的对美政策。即使不得不谈到后者时，最多也只是一笔带过，很少能够提出细致的叙述或是深入的分析。更有进者，即使在它们偶尔处理的过程中，多半只是提出假设、臆度和猜测，很少能够列举事实来支持它们的说法。这种现象当然无法令人满意。最浅显不过的理由是，两国同盟关系是一个双方互动的关系。其中任何一方所持的观感、认知和所作出的决定，都能引起对方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又会刺激原来一方下一波的反应。这种“反应—反反应—再反应”的行为模式，是任何想要阐述同盟关系的学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因此，假如学者们只以其中一方的目光去研究同盟关系的话，他们就无法让读者们真正了解同盟关系中极为丰富而又错综复杂的互动内容。不幸的是，现有的学术著作中很少着力去剖析同盟的“关系”。换言之，它们只讲了故事的一半。

第二，正因为某些研究者选择只把研究重点放在一方（美国），因此他们没有兴趣去参考另一方（中国）的资料以充实他们的叙述。最糟糕的情形是有关中国的基本史实都会有错误的叙述。这也难怪，因为有的学者根本不懂中文，但是仍然写出大部头的美中同盟关系著作。中文资料的完全不被引用，最后不但导致他们的

史实叙述缺乏完整性和平衡性，也必然损害到他们分析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有鉴于此，本书最基本的愿望，不是在于对目前的学术成果作翻案文章，也不是为了历史上的某人某事去作专题性的更正工作，而是在中文和英文两部分史料的基础上，全面性地重新梳理战时中美军事合作关系，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史实叙述，特别强调的方法论是两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前所言，一方的行为不但会引动另一方的反应，即使是一方对事实的误解或是对另一方动机的误判，也会引动一连串后继的误解和误判的结果。就像是一盘棋局或是一场拳击一样，只有当学者们把双方的行为和动机都充分描绘出来时，读者才能看清楚这个活动的本质。如果关系的一方缺席或是变成隐形人，那么读者只会坠入五里雾中。由于本书作者认为“互动”是中美同盟关系最重要的本质，而本书的目的是要想把这些关系以动态的方式显示出来，因此，对于某些熟知中美同盟关系史而又细心的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该可以发现，本书所引用的一部分历史事件看起来相当眼熟，因为它们早已被学者们多次引用过。但是它们在本书中所描绘的故事却和以往的著作有重大不同之处。其原因是本书作者认为有许多“众所周知”的史料曾经被多次误用，因此需要加以重新组织，在本书中作为一个新的描述的素材或是新的立论依据。更重要的是，本书还发掘了许多以往著作所忽略甚至有意规避的史料。本书作者希望通过这些新史料去填补以往学术著作的局限性。本书最低的愿望是把历史的真相呈现给读者，进而向读者们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去分析这段历史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回归历史原貌的工作上作出一份努力。更进一步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本书能够把“前事”说得明白清楚，使中美两国政府都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或是吸取一些教训，进而把两国的关系处理得更平稳顺利，那就更是本书的意外收获了。

在本书漫长的研究准备期间，作者曾经得到许多单位的协助。在研究资料方面，中文资料部分曾多次得到地处台湾新店的“国

史馆”^① 同仁们的慷慨协助，不但在提供资料上服务态度专业，而且在照顾访问学者生活的工作上也是尽心尽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赠送的出版品也给作者很大的方便。此外还使用过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和“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的资料。其他在美国的中文和英文资料部分给予我协助的有：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库、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密西根大学图书馆、史丹福大学图书馆、胡佛总统图书馆和马歇尔将军图书馆。

在研究经费方面，我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任教时，1980年代曾得到教授研究费的补助。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时，1990年代曾多次得到慷慨的教授研究经费补助和研究假期，使我在海外的研究工作得以持续。2002~2003年度承蒙台湾中研院欧美研究所的厚爱，聘请为该所特聘研究员一年，并提供非常优良的研究环境。2007年秋季又承胡佛总统图书馆邀请，专程到该馆阅读蒋介石日记。以上这些学术研究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善意关怀、专业协助和经费资助都使我感激不尽。除此之外，作者没有接受任何来源的补助，也没有循由其他途径取得任何不向一般学者开放的资料。

多年来还有一大群家人、朋友和同行关心我的研究进展，并且给予各种程度的指教和协助，在此只能向他们致诚挚的谢意。在本书定稿之前，承蒙两位不具名的评审员对稿件作出细心的阅读和坦诚的批评指正，使作者得以及时改正错误和充实内容。最后又承联经出版公司方清河先生费神在文字上提出许多宝贵建议。他们的精神支持和具体协助都是本书得以问世的重要因素。但是还是有三位人士对于本书所做的贡献，需要在此特别提出。

一位是邹谠教授。我刚到芝加哥大学念书时，正值他的经典之作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出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该书所展示的深刻度超过许多其他同期乃至后期的著作。他的治学态度和成

^① 引号为中文简体版编者所加。此类情况下同。——编者

就，在日后的年岁里，也给我提供了一个自我期许的楷模。虽然当时依照学校课程规定，我只选修过邹先生两门课，但是在此后数十年中，我一直和他保持密切联系，也接受过他和邹夫人卢懿庄博士无尽的关怀和提携。邹先生更令我景仰的却是他的为人风范。纯真、无私、宽厚、谦虚、诚恳和助人等种种君子的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流露无遗。因此，无论在道德上或是文章上，邹先生是我一生中有幸认识的一位好老师，他的关照和鼓励都令我怀念不已。本书写作的原始动机可以说来自邹先生的言教和身教。

第二位是美国马歇尔将军图书馆的基层工作人员 Martha S. Gansz 女士。我在去该馆研读资料前与她并不相识，研究工作结束后也未曾保持联系。但是我在该馆进行的过程中，她所显示的专业素养，尽心尽意的协助，主动的关切和人情的温暖，使我的阅读效率增加数倍。如果世上资料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待人接物的素养都能和 Gansz 女士一样的话，学术发展的速度将会突飞猛进。她是我能够想象的最好的资料管理员和研究协助人的楷模。因此，我对她有一股难以自抑的感激，同时体会到自己是何等的幸运。

第三位是我的朋友陈永发教授。他多年来不但一直鼓励和关心我的研究进度，而且在本书初稿完成后，慷慨地答应为我审读。在此后一段长时间里，永发兄花费了大量宝贵时间和精力，提出各种修改的建议。举凡在史证、推理、分析和立论等各方面，本书都得到了他无数的珍贵意见。作为一位同行和朋友，他对本书所提出的坦诚批评和慷慨协助，实在是作者最大的受益。

当然，本书内容仍然存在的谬误，全部是作者个人的责任。

写作凡例

1. 本书尽量避免引用过去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虽然本书所讨论的范围与史学界许多著作有高度重迭性，但是本书尽量不去引用这些著作，原因并不是本书作者不熟悉这些史学界的成就，而是本书的叙述和立论与它们大不相同。正如在“作者的话”中所陈述的，本书作者当然必须仔细地阅读这些著作，而且这些著作也正是促使作者撰写本书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由于彼此在叙述、立论和分析等各方面都存在重大歧异，因此为了避免逐章逐节地去加以说明或是争辩，作者选择了专心地向读者提供自己对这一段历史的了解。换言之，为了对读者的尊重，本书的出发点不是在与别人打笔仗，而是希望能够依靠资料使历史回归原貌，一切信赖读者去作判断。

2. 无论中文或是英文的史料，本书所参考者都尽量以原始史料为准。即使该项史料曾经被其他学者广泛引用过，本书作者仍然坚持去研读原件，其目的并不是去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重复工作，也不是向读者炫耀本书研究工作的深度，而是为了要经过独立判读

的过程去了解原始史料的意义，免受他人影响。虽然史料已经被学者广泛使用（最好的例子是史迪威已出版的日记），但是不同的学者对于同一件史料的取舍和感受都可以大不相同。因此为了不落入“人云亦云”的窠臼，对原件进行独立研读最能保持历史真相。

3. 本书引用旧史料的目的并非在重述以往的学术成果，而是希望用之来提供新的观点和解释。因此，尽管史料可能似曾相识，但其作用并不相同。同理，本书的注解中也引用了部分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其目的也并不是重复它们的观点，而是标示本书与它们不同之处。此外，本书还引用了大量新史料，也希望用来补充、修正或是重建这一段重要的历史。这两种史料大致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分散在各档案馆的原件（真迹或影印本），二是有些已经被汇编成书。本书作者在作研究工作时曾经尽量对比原件和出版的汇编版本的准确性。本书所采取的基本措施是，凡是已经汇编出版成书的史料，如果其内容与原件完全相同时，则本书只引汇编的书，以方便读者参阅（例如《战时外交》一书）。但是如果汇编书中的文字与原件有出入时，则只引原件以求真实。换言之，如果读者发现一件史料已经包括在汇编集中，而本书却引用原件的话，极可能是作者发现汇编有失误或是删除的痕迹。这种情况在中文和英文史料中都存在。

4. 注解尽量标出引用原件的存放地（档案馆），以方便读者查询。

5. 本书注解以中英文分别处理，一般原则是依原件的文字为标准。这样不经过翻译手续，可以帮助读者找到原文出处，也可以节省印刷篇幅。

6. 无论原件为中文或是英文，注解均以最简洁方式标明其主题及其他重要信息，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照引原件标题的全部文字。对于大型档案的名称也依同样原则处理。目的在节省篇幅和避免造成混乱。

作者的话 / 1

写作凡例 / 1

前 言 珍珠港事变前中国之缩影 / 1

壹 中国外交处境 / 1

贰 国内情况 / 2

叁 蒋介石作为中国领袖的真相与幻象 / 8

第一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及中国的反应 / 10

壹 日本攻击珍珠港消息传到中国时 / 10

一 蒋介石个人的反应 / 11

二 中国在宣战前的考虑 / 14

三 中国无法说服苏联参战 / 17

贰 蒋介石早期对于建立同盟关系的乐观和努力 / 18

叁 同盟关系的第一株毒草：对中国的排斥 / 21

一 中国对盟邦歧视的不满 / 21

二 中国担心被边缘化 / 24

三 一个粉饰工作的失败：熊式辉代表团的尴尬 / 29

四 中国对于遭受排挤反感的原因 / 34

肆 中英摩擦不断升级 / 38

一 对英国强盗行径的愤怒 / 39

剑拔弩张的盟友

- 二 缅甸与东南亚 / 43
- 三 中国对英国动机的疑惧 / 47
- 伍 中国决心亲美 / 48
 - 一 美国军援 / 48
 - 二 马格鲁德将军的角色 / 53
 - 三 美国财政援助 / 56
- 陆 小结 / 60

第二章 派一位美国将军到中国战场 / 63

- 壹 蒋介石邀请美国派军官担任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 / 63
 - 一 蒋介石提出邀请的动机 / 63
 - 二 对人选品质的要求 / 65
 - 三 对职务的界定 / 68
- 贰 美国最初的反应：庄穆将军的遴选过程 / 69
 - 一 庄穆将军之入选 / 69
 - 二 庄穆的对华方针 / 70
 - 三 庄穆提名程序的突然终止 / 72
- 叁 中美对派华军官职称内涵的谈判 / 74
 - 一 美国把职务范围逐渐扩大化和复杂化的过程 / 74
 - 二 中美两国所强调的重点大相径庭 / 80
- 肆 史迪威获得新任命 / 83
 - 一 史迪威的入选 / 83
 - 二 史迪威的专业素养 / 85
- 伍 史迪威对中国的态度 / 88
 - 一 史迪威对其使命最初的观感 / 88
 - 二 中国人对史迪威任命的乐观反应 / 93
- 陆 史迪威赴华履新 / 94
- 柒 小结 / 96

- 第三章 第一次缅甸战争：1942年1~4月**
——同盟国军事合作的困难 / 101
- 壹 第一次缅甸战争在中美同盟关系中的重要性 / 101
- 贰 珍珠港事变前有关缅甸防务的计划 / 103
- 一 中国的计划 / 103
- 二 英国的计划 / 105
- 叁 珍珠港事变后盟军在缅甸的合作 / 106
- 一 中国主动采取的行动 / 106
- 二 英国的反应 / 107
- 三 开战初期中国对空中运输路线的探索和美国
的反应 / 108
- 四 中国加紧准备在缅甸作战 / 111
- 肆 战争的初期：1942年1~2月 / 112
- 伍 战争全面展开：1942年3月 / 113
- 一 蒋介石视察缅甸前线 / 113
- 二 史迪威开始工作 / 114
- 三 英国的防务安排 / 116
- 四 仰光沦陷及其影响 / 117
- 五 史迪威拿到指挥权 / 118
- 六 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开始分歧 / 120
- 七 英国因素再度抬头 / 123
- 陆 1942年4月：战局大变 / 126
- 一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摩擦与妥协 / 126
- 二 战局日益险峻 / 129
- 第四章 第一次缅甸战争：1942年5~6月**
——惨败及其影响 / 136
- 壹 同盟国战线总崩溃：1942年5月 / 138
- 一 史迪威抛弃中国军队脱离战场 / 138

剑拔弩张的盟友

- 二 美国人指控罗卓英临阵潜逃 / 141
- 三 史迪威跋涉赴印度的神话 / 143
- 貳 中美双方对缅甸战争最初评估的差异 / 147
 - 一 美国人的观点 / 148
 - 二 战争进行中的主要分歧 / 151
 - 三 中国观点的逐渐形成 / 157
- 叁 中国愤怒的升级 / 165
 - 一 史迪威的第一份报告 / 165
 - 二 蒋介石最初的反应 / 167
 - 三 蒋介石心情的大起大落 / 169
 - 四 6月15日的重要会谈 / 170
 - 五 蒋介石企图改变与史迪威关系的失败——6月24日的会谈 / 171
- 肆 中美两国对于缅甸战争不同的期望 / 177
 - 一 史迪威的期望 / 177
 - 二 中国人的期望 / 179
 - 三 文化和个性的冲突 / 181
- 伍 缅甸战役对中国的影响 / 185
 - 一 史迪威对中国实况的认知 / 185
 - 二 缅甸战败对蒋介石的当下和长远影响 / 193
 - 三 蒋介石面临的政治风险 / 200
- 第五章 中美关系危机迭起：1942年6~7月 / 204**
 - 壹 中国不断高涨的怨愤 / 204
 - 貳 中国对美国军火和飞机供应指望的落空 / 206
 - 一 蒋介石和史迪威6月15日的会谈 / 207
 - 二 中国长期以来对美国军火的期望 / 208
 - 三 中国在1942年中期对军火要求的新动机 / 210

- 叁 美国飞机的移防 / 215
- 肆 “三项要求”：一个经过加工处理的“危机” / 218
 - 一 6月29日的会谈 / 220
 - 二 蒋介石“三项要求”的意图 / 224
 - 三 史迪威对“三项要求”的看法 / 230
- 伍 一个新危机：史迪威名目繁多的职权 / 233
 - 一 对于危机起因互相矛盾的记载 / 233
 - 二 史迪威不请自来的声明 / 236
 - 三 中国人的反应 / 239
 - 四 原始安排的漏洞和事后的补救 / 240
- 第六章 居里的和解之旅：1942年7~8月 / 251
 - 壹 居里访华的背景 / 251
 - 一 缘起 / 251
 - 二 宋子文反对居里使命 / 252
 - 三 蒋介石的态度 / 253
 - 贰 会谈初期的攻防战 / 255
 - 一 双方集中火力相互攻击 / 255
 - 二 居里意图改善中英关系心愿的落空 / 256
 - 叁 中美关系冲突的重点 / 257
 - 一 飞机移防和“三项要求” / 257
 - 二 史迪威的多重职务 / 260
 - 肆 一个节外生枝的干扰：宋子文涉嫌扣留罗斯福电报 / 263
 - 一 居里提出指控 / 263
 - 二 宋子文的回应 / 264
 - 三 史迪威的反应 / 265
 - 四 电报事件对居里态度的影响 / 268